

# 文学理性的世纪课题

辽宁大学中文系 组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理性的世纪课题/辽宁大学中文系组编.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 1

ISBN 7-5610-3910-7

I. 文… II. 辽… III. 文学理论-研究-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8667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60 千字 印张: 11

印数: 1—1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文禄

责任校对: 陆立生

封面设计: 刘桂湘

定价: 15.00 元

# 目 录

|         |     |
|---------|-----|
| 序 ..... | 张 炯 |
|---------|-----|

## 古代文学部分

|                                                 |           |
|-------------------------------------------------|-----------|
| 先秦文学研究跨世纪构想 .....                               | 许志刚 (1)   |
| 屈原追求的人格理想及其幻灭 .....                             | 曲德来 (18)  |
| 论《诗经》的抒情特色 .....                                | 王延海 (36)  |
| 试谈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                       | 王 巍 (50)  |
| 陶渊明文学个性的文化阐释 .....                              | 涂光社 (70)  |
| 荀子“辩言”论的时代特征和理论意义 .....                         | 涂光社 (93)  |
| 王安石百年荣辱沉思录<br>——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与现实性的思考<br>.....    | 毕宝魁 (110) |
| 《金石录后序》署年考辨兼论李清照生年 .....                        | 毕宝魁 (123) |
| 《红楼梦》创作借鉴《金瓶梅》考论 .....                          | 董文成 (137) |
| 济公小说的版本及济公形象的演变 .....                           | 胡 胜 (184) |
| 文学观念的变化与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建设<br>——试勾勒中国文学史学科百年历程的轮廓 ..... | 钟林斌 (203) |
| 论宋濂与刘基 .....                                    | 夏咸溥 (239) |

## 文艺学

|                  |           |
|------------------|-----------|
| 文本的意义解读与类型 ..... | 王向峰 (258) |
|------------------|-----------|

|                  |          |
|------------------|----------|
| 中国文艺学的世纪转换 ..... | 高楠 (271) |
|------------------|----------|

## 现当代文学

|                          |           |
|--------------------------|-----------|
| 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的独特价值及审美衍进 ..... | 王春荣 (294) |
|--------------------------|-----------|

### 无根无体

|                      |           |
|----------------------|-----------|
| ——谈新文学现代派的中国特色 ..... | 赵凌河 (306) |
|----------------------|-----------|

### 文艺学当代特色

|                    |          |
|--------------------|----------|
| ——论台湾乡愁诗的当代性 ..... | 李倩 (319) |
|--------------------|----------|

|                 |           |
|-----------------|-----------|
| 论历史剧的本体特征 ..... | 吴玉杰 (332) |
|-----------------|-----------|

# 先秦文学研究跨世纪构想

许志刚

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从宏观的角度回顾一下先秦文学研究百年的历程，探索下个世纪先秦文学研究发展的基本趋势，或许有助于提高研究队伍的自觉意识，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 本世纪先秦文学研究的变革与成就

本世纪的先秦文学研究取得了以往各个历史时期无可比拟的成就，无论从研究主体的数量、素质论，还是从研究的物化成果看，这百余年来先秦文学研究所取得的业绩都是令人鼓舞的，同时，它的成果和经验也为其在下个世纪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先秦文学研究的成就数不胜数。但从大的方面看，至少以下几方面的历史性突破是学术界所公认的。

首先，先秦文学从经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展现出其作为特定时期文学的本然风貌。先秦文学再也不是人们只能顶礼膜拜的圣人制礼作乐的产物了。《四库全书总目》云：“经稟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赘述。所论次者，诂训而已。”<sup>①</sup>在所谓的圣人亲自制作的最高经典面前抱如此态度，自然就无法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了。如《诗经》在清代及其以前的研究中，无论汉学、宋学，还是乾嘉之学，都不能不首先肯定其神圣意味。陈奂为清代著名学者，其观点

和著作足为当时正统学术的代表，他说：“昔者周公制礼作乐，诗为乐章，用诸宗庙、朝廷，达诸乡党、邦国。当时贤士大夫皆能通于诗教。孔子以诗授群弟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又曰：‘不学诗，无以言。’诚以诗教之入人者深，而声音之道与政通也。”<sup>②</sup>在上个世纪末，即使是力主变法、改良的代表康有为，也不敢公然地否定经学。他只能以维护经学之名否定经学，在捍卫古道、传统的旗帜下推行自己的主张。<sup>③</sup>

进入本世纪之初，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五四”运动之前，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给予封建传统文化以强有力的冲击、批判，锋芒所向，直指“六经”和封建礼教。先秦文学研究经历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人们对“经”、“传”的怀疑、否定，打破了环绕在先秦文学之上的神圣光环。其间，很多学者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等著作，虽不以先秦文学为研究对象，然而，其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推动之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时，他在《文学小言》一文中，更明确地将《诗经》中的《燕燕》、《采薇》、《四牡》等诗评为体物抒情最成功的作品。同样的，先秦时代其他文学文本如《尚书》、《左传》、《论语》、《孟子》等，也都以新的面目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现代文艺学的观点、方法，在先秦文学研究中不断地推陈出新，取得极大进展。

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仍当首推王国维。他率先向西方寻求真理，对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学说用力甚勤，汲取了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他对《红楼梦》和古代戏曲的研究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直到现在，其《宋元戏曲史》作为一部分体断代文学史，还有许多成就是后人无法企及的。他在先秦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远逊于在小说、戏曲研究中的地位。然而，他的上述成就给予人们的直接启迪，就在于只

有接受先进的理论、方法，先秦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才能突破现有格局。

继之而起的则以胡适、鲁迅、闻一多、郑振铎为突出。

胡适留学美国。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如进化论等对他都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以其老师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则更为广泛、深刻。这些理论给他以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他曾多次谈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无不以实验主义哲学为理论支点。他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鲁迅留学日本，闻一多留学美国，都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美学思潮的熏陶。闻一多在先秦文学研究中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融合的倾向，他所取得的成就，都可以成为当时的代表。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训诂学同当时流行于西方的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神话学的观点方法结合在一起，以研究先秦文学，他的《伏羲考》论述了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形象与图腾崇拜的关系，论述了他们二人始为婚姻的传说同原始社会广泛存在的兄妹、姐弟结亲现象的渊源关系。其他如《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姜嫄大人迹考》、《说龙凤》、《说鱼》、《匡斋尺牍》等篇，也都因其理论的新颖、分析之深入，为学术界所瞩目。

“五四”运动之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率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人将这一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如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所写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他所推崇的几乎都是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进入20年代，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已经成为他的文章的重要内容。李大钊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他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对学术界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至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更广泛、更自觉地运用于古

代文学研究，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在新的形势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于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努力转变自己的理论支点，更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迅速成长起来。卢兴基主编的《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一书分列 25 个专题，概括了古代文学研究界对这些问题讨论的情况。从现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水准看，这些争辩中，不免存在理论上的稚嫩和一定程度的片面性与失误。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该书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记录了古代文学界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历程。

第三，先秦文学研究队伍成长壮大，各种文学文本的研究都取得重大进展。本世纪的先秦文学研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其队伍也迅猛发展、壮大。研究队伍的成長主要体现在人数的众多和素质的提高。就素质而论，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探讨的深度、论题的广泛程度、论著内容的广博严谨，从总体上看，迥非以往各个时代所能比拟。从研究客体方面看，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角度，本世纪的研究都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有些领域引起学术界广泛、长期的关注，从而形成具有独立性的研究方向。如《诗经》、《楚辞》已经成为大批学者的长期研究课题。经常举办全国性的或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出版研究专集，许多博士、硕士从中选择学位论文课题，在学术界的努力下，还成立了《诗经》学会和《楚辞》学会。对孔子、孟子和儒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变化。经历了“五四”运动的震荡之后，人们不是简单地打倒之、抛弃之，而是要认真思考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之久的文化、思想原因，从而更进一步认识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学的特殊作用，从而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中华孔子基金会的建立，每次有关孔子与儒学的学术讨论会必汇集文史哲各方面的学者，都表明孔子和儒学在失去圣人、经学的光环之后，



作为一个哲人和学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早已为世界各国学者所关注。然而，我国学术界对道家的研究却时冷时热。在本世纪末的二三十年，道家作为研究方向，吸引了大批杰出学者，对老子、庄周其人的研究，对其学说精神意蕴的阐述，尤为前此各朝代不能企及。

此外，对先秦文学发展规律的研究，对先秦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奠基作用的研究，对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艺术精神的研究，都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

总而言之，本世纪的先秦文学研究在各个方面都获得重大进展，同时，也为其在下个世纪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 新时期呼唤理性

本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界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以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以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就昭示我们。人类在文化领域内的理性探讨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应该将这些理性认识更广泛、更深入地运用于古代文学研究中，运用到先秦文学研究中，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成为无愧于新时代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对理论上的进步和存在的某些失误，作出冷静的合于实际的分析，不能因为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稚气和偏差，就简单地否定了理论观点和方法在先秦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适得其反，稚气和失误的存在正表明学术界需要增强理性意识，提高理论水平。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沉痛反思之后，尤其应当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同先秦文学研究的关系。在这方面，杨公骥师和张松如师的言传身教，使笔者看到前辈学者理论修养的博大精深。程千帆先生也“一直主张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应

该采取将考证和批评密切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所谓的批评，就是“在新文艺理论和思维方式上不断拓宽治学之路”。<sup>④</sup>前辈学者学贯中西的知识结构和高度的理论修养，昭示出先秦文学研究的成功经验和必由之路。他们奠定了古代文学研究界走向新世纪的坚实基础。未来的先秦文学研究正应当从这里起步。

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提高理论修养，通过著书、撰文而创立新说，将成为先秦文学研究领域的普遍要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美学原理的研究和运用，将更加成熟。经过对 60 年代以来的极左思潮的反思，特别是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痛定思痛，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种简单化、片面化的信仰危机。勿庸讳言，在以往的一个时期，学术研究带有一定程度的片面化、公式化倾向。但是，如果因此就忽视了几十年间广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忽视了由此而导致的人们精神面貌、研究态势、学术成果方面的巨大变化，则会陷入另一种片面性。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文学作品及其中的艺术形象总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的活动的产物。在这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起着最终的制约作用。在这种物质条件的制约下，形成了当时的区别于其他时代、其他条件下的人。这些具有自己的时代和处身其间的物质条件的特征的人，生产了自己的观念、思想，从而也在文学活动中创造出自己的艺术形象。因此，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如果不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便无法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也就无法理解他们所创作并且成为思想、感情的艺术再现的文学形象。而当时的生产力的状况及人们的物质关系，则是理解该时代艺术形象的最根本的因素。

以《诗经》来说，绝大多数作品产生于西周盛世到东周前期的几百年间。这是在十分具体的物质的、精神的条件下成长

起来的一代创作主体。他们具有与自己的条件相适应的，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性格。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受到外界条件的感发，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他们所特有的感情和审美取向；见诸文学艺术，发而为诗、为其他文学样式，便创作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学作品，塑造了文学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因此，这些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乃是主体的性格在具体条件下不自觉地艺术再现。要理解这些作品，就应该充分了解周代人，了解他们的生活与精神。而周代的礼乐文化乃是当时统治思想的集中表现，其有关为人处世、礼仪规范的许多规定，已成为制约周人的准则，并逐渐浸润而成为他们性格的基本内涵。因此，要解读这些文学文本，就必须研究环绕着主体并制约着他们的礼，还应进而研究礼的现实依据，即领主的土地占有形式和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剥削形式等物质的、精神的条件。这样，才有可能较为客观地认识艺术形象中所凝聚的历史性内涵。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认识贯穿于作品之中的艺术创作规律。

在致力于学贯中西的进取中，我们也应像本世纪学界泰斗那样，对西方哲学、美学领域一些重要流派的理论、方法，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不论其为社会学的、文化学的，还是原型批评、结构主义、释义学等理论、方法论，只要有助于先秦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就应该合理地吸收、运用。

仅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先秦文学赖以发展的精神文化条件，决不是单一的文化基因构成的。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代表了当时文化结构中较为自觉的部分，如周代的礼乐文化、汉初崇尚的黄老之学以及后来被推至独尊地位的儒学、宋代的程朱理学等，它们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起着支配作用。从《左传》、《国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礼的思想和准则贯穿于人的一生，浸透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样的，它也自然地浸润于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作品中艺术形

象的灵魂。《左传》中随处可见的“礼也”，“非礼也”等论断，既反映了人们的善恶观，也反映了人们的美丑观。因此，不了解当时的礼乐文化，也就无法理解《诗经》、《左传》等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其次，在文化的构成中，还有为社会各个阶层普遍接受的宗教文化，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们精神、性格的独特之处。此外，地域文化、部族文化、风俗习惯等都同文学、同作家的艺术激情、艺术创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应该说，那些在世界学术的不同领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理论，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合理内核。在这些理论引入我国学术界之初，也曾有过简单的、甚至是套用的幼稚阶段。这样的研究成果自然无法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然而，其突破现有格局的努力是可贵的，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任何简单化的做法，只能使其辛辛苦苦的研究黯然失色，使其失去作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然而，缺乏理论深度的研究，也与学术研究的宗旨有一定的距离。<sup>⑤</sup>在未来的研究中，先秦文学研究界会更加成熟，一定会充分运用各种理论、学说的合理内核，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作出令人信服的研究。

## 新的文学文本、文学版本与先秦文学研究

王国维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中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sup>⑥</sup>。”

诚如王国维所言，汉代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时所发现的《古文尚书》等著作，晋代在汲郡所发现的《竹书纪年》等文献，都曾给予先秦文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敦煌

写本的发现也给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可是，这些“学问上之发现”同 20 世纪考古成就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是无法相比的。

20 世纪的考古工作为先秦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大批商、周、秦、汉墓和古代建筑遗址的发现，古墓葬中大量古代器物的发掘、清理，使我们直接了解到古代人生活的一些真实状况，对制约他们精神活动的物质条件，也有了可靠的证据和直观感受。

从先秦文学研究的对象方面说，本世纪出土的各种文献，无论在数量、范围，还是在时间跨度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历次发现。

商周青铜器并不都是本世纪发现的。但是，充分发掘这些彝器及其铭文的学术价值，则是本世纪的新认识。这些资料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可补历史文献之不足的无价之宝。因此，学术界一方面继续广泛地进行考释、识读工作，另一方面，则更多地将其运用到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应该看到，对金文学术价值的重视并实际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工作，各个学科在认识上、在实际工作中的努力，是并不平衡的。总的说，历史学界取得的成效更为显著。如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陈梦家的《殷周青铜器通论》等著作，直接论述了青铜器及金文的学术意义。李学勤的《东周与秦代文明》、许倬云的《西周史》、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张之恒和周裕兴的《夏商周考古》等著作都充分发掘并运用了考古成果，充分发掘了金文的文献价值。

在先秦文学研究界，也有些学者提供了同样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于省吾的《泽螺居诗经新证》，将金文与古文献相互印证，以研究诗骚，每每发前人所未尝发。闻一多的《古典新义》之所以能够令学术界耳目一新，同他在理论方面的突破，同他较多地运用古文字研究成果，都有着十分密切

的关系。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则运用了大量古文字资料。陆思贤的《神话考古》从原始崇拜的图腾柱入手，根据考古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对中国上古神话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日本学者白川静的专著《诗经》中也引用了很多金文，增强了该论著的说服力。

前哲时贤的研究表明他们对甲骨文、金文十分重视。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充分发掘了这些新的特殊文献的史料价值。

周代彝器有铭文者达数千件，有的铭文篇幅较长，如《毛公鼎》长达 497 字，其他三四百字的也很多。仅从字数的多少说，它们已经超过了先秦时代的一些文学文本。至于其内容，有些文本可以同《诗经》、《尚书》相印证，有些器物的铭文本身就是一篇文学作品。尽管自南宋以至于上个世纪末，时有学者从事这方面研究。然而，本世纪青铜器的大量出土，金文的大量隶定、识读，为学术界提供了前人很难见到的文学文本。于省吾等人的研究，要比汉代、宋代经学家或者清代诸儒的视野更加开阔，也比他们的论说更具说服力。

与金文文本相比，竹简、帛书则是另一个丰富的文献宝库。如解放后出土的居延汉简多达 1.9 万余枚，有史以来出土简牍数量之多莫过于此。而山东临沂银雀山 1 号汉墓、河北定县 40 号汉墓、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都出土了大量非常重要的文本。其中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乙本为一些学者所重视，然而，也有一些人并未认识到这些考古成果同自己的研究工作间还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事实表明，凡是在这方面认识高的学者，其研究工作也必具有新的活力，也较易于突破现有的格局。

这些竹简、帛书数量很大，种类繁多。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新发现的文本和新发现的最古老的版本。

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先秦典籍，多属汉晋以后流传下来的

文本。这些文本中，脱文、错简、衍文、讹误所在多有。人们针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的校勘整理工作，然而，因所据之本最早的也不过为宋代人刊刻，其与先秦文学文本之原貌是否相合，总是难以确定的。《老子》一书中就有些引起争议的千年悬案，如第三十八章云：“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对“下德”句历来聚讼纷纭。帛书《老子》甲本、乙本发现之后，流传中误抄、讹夺之事便较易于解决了。在这方面，张松如的《老子校读》、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等，都以充分利用考古发现新成果而使其研究独步学林。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成就表明，考古界已经为先秦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很多最重要的、最早的文学版本，《诗经》、《论语》、《仪礼》、《周易》、《孙子兵法》、《管子》、《晏子春秋》等研究对象都产生了这样的变化。在面向新世纪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知道《齐论语》、《鲁论语》、《古文论语》，还要重视《竹简本论语》。在未来的先秦文学研究中，不应像以往那样恪守家法，或仅仅依据宋代善本、清代校本以定是非，而应斟酌传本与竹简、帛书本以知去就。若研究《老子》仍以河上公之说为旨归，则未免昧于知古，其研究已经落后于本世纪后期，又何论新世纪。

竹简帛书中还有很多新的文本，如《大事记》、《战国纵横家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儒家者言》、《孙臧兵法》等，此外，还有些尚待整理、发表的新的文本。这些文本有的见于历史记载，有的甚至为史册所不载。这些文本一方面可补历史记载之不足，另一方面也重现了先秦文学文本的真实面貌。这使它们具有了其他文本无法比拟的价值。有些学者在研究这些新的文本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如张震泽师的《孙臧兵法校理》，积数年之力而成，实为新文本研究之力作。此外，陈直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国内外一些学者对竹简、

帛书的研究，都表现出对此类新文本的特殊重视。在未来的学术发展中，上述文学文本的重要性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对这些新文本的研究必将为先秦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在先秦文学这一古老的领域开拓出新的局面。

## 地缘文化、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的多元结构

华夏民族是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她本身经历了自黄帝、炎帝以来各个部族间的交往、侵伐、融合，不断地壮大自己、丰富自己。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否定融合，反对并排斥其他部族的主张，如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这是周文王的太史佚的观点，同时，季文子引用史佚的话以论鲁同楚的关系，也表明了当时人对部族关系的认识。至于说“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中庸》）、“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等，更是严华夷之辨的代表性观点。然而，中国始终在汇聚各个部族、各个民族的过程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学，也伴随着这一进程而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学。

正是这样长期、复杂的部族融合，给予先秦文学以巨大的推动力，形成了先秦文学多姿多彩的风貌和多元结构的统一体。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将有助于加深对先秦文学各组成要素相互关系的了解，有助于对先秦文学整体特点与局部风貌的把握，有助于对先秦文学发展过程、演变规律的认识。先秦时代各部族间相互交往的关系，各部族固有的文化，使先秦文学与文化表现出多层次的丰富性，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必将导致对先秦文学规律乃至中国文学规律的认识走向深入。

李炳海的《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堪称本世纪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他认为，“把先秦文学和部族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可以拓宽视野，解决其他方法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把先



秦文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如果用文化学的方法研究先秦文学而忽视部族文化因素，那么，文化学方法的运用就是不深入、不全面的”。在这项课题的研究中，他对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神话学资料重新审视、运用，廓清了一系列部族文化问题，同时也对部族文化给予先秦文学的深广影响，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从而对《诗经》、《楚辞》和《庄子》的论述也别开生面。张碧波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则代表了近年在部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研究中的突出进展。该书认为，“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流、融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的文化传统，保持了一种旺盛的活力，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文化历史现象”。基于这样的认识，该课题组将匈奴以至于满族的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同中原华夏文化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点，开辟了古代史和古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此外，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以及一些学者关于吴越文化、蜀文化、齐鲁文化等等的研究，都在这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在下一个世纪，先秦文学研究应从上述学者的努力中寻求启发，寻求走向未来的新起点，重新审视先秦文学和先秦文化的多元组成，重新审视古代文献的记载，以期发现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例如，前面所引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语，是针对楚人而言，但是，到了汉代，楚人统一了中国，楚歌、楚舞、楚俗进入了宫廷、文坛，从而造就了此时文学的新的色彩。

同样的，历史上的有些记载，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也会呈现出新的意义。如所谓黄帝 25 子，其得姓者 14 人，所谓帝喾有四妃，则殷、周同出于帝喾（均见《史记·五帝本纪》、